

《呐喊》：“声”的结构与狂人的言语

黄嘉庆

引言

自留日时期的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破恶声论》，至于后期杂文，鲁迅长期围绕个人主体性问题展开思考，并撰写了大量文章。其中，最能直接体现其关怀的概念之一，便是出自《破恶声论》的“心声”；围绕这一概念，研究者已展开了相当丰富的讨论。例如，伊藤虎丸在《初期鲁迅におけるヨーロッパ覚書》及《初期鲁迅の宗教観》中，在“伪士”与“迷信”的框架下指出了“心声”的精神性。在中国，汪晖于《声之善恶》中，基于历史语境梳理了《破恶声论》的思想，并考察了“心声”与鲁迅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。季剑青则从白话一文言的框架出发，考察了鲁迅早期文学创作中对于“声”的“探求”。此外，姜异新主张，从《破恶声论》到《呐喊》的作品群背后，长期存在着鲁迅对于“声”的关切。李怡则进一步关注《破恶声论》中的“思考样式”（思维方式）。¹

然而，既有研究往往直接论述“心”（内面、精神），而似乎并未给予“声”以充分的注意。不关注“声”，并不只是意味着缺少形式层面的分析。“心”看似理所当然，实际上却是不可见的存在；真正可见的，始终是“声”。因此，若要分析“心”，就必须首先分析“声”，并且根本上也只能分析这种“声”。倘若绕过“声”而直接分析“心”，那么这种分析便只能流于神秘。另一方面，若要考察鲁迅意义上的“声”，不仅需要分析某一作品的叙事形式，也必须深入到词与词、句与句之间的连接关系。因为正是词与词、句与句之间的具体关联，构成了“声”。围绕鲁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。分析主体性，首先且根本上，就是分析主体性的表象。如果直接在“心”或主体性的层面展开论述，那么下面这一段《呐喊》中的文字便很难得到把握。它出自《风波》。

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，也想想些方法，想些计画，但总是非常模糊，贯

¹ 参见：伊藤虎丸《鲁迅と終末論 近代リアリズムの成立》（龍溪書舎、一九七五年）

伊藤虎丸《近代の精神と中国現代文学》（汲古書院、二〇〇七年）

汪晖《声之善恶：鲁迅《破恶声论》《呐喊·自序》讲稿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、二〇一三年）

季剑青《“声”之探求：鲁迅白话写作之起源》（《文学评论》二〇一八年第三期）

姜异新《從“呐喊”到《呐喊》：論“破恶声”之鲁迅文学的發生》（《鲁迅研究月刊》二〇二四年第四期）

李怡、李揚等《我讀《破恶声論》（上）——二〇二〇秋西川讀書會紀實》（《上海鲁迅研究》二〇二三年第一期）

穿不得：「辫子呢辫子？丈八蛇矛。一代不如一代！皇帝坐龙庭。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。谁能抵挡他？书上一条一条写着。入娘的！……」²

这是七斤面对复辟等一连串事件、思考应对方法时的自言自语。乍看之下，这是一段诉诸荒谬的话语，也很容易被当作国民批判而一笔带过；然而，若问七斤在此究竟具备何种主体、何种“心”，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尖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直接进入“心”的层面，七斤的“心”便会变成无法把握之物。无法把握之物，也就无法作出准确的评价。然而，这类混乱的话语在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中屡见不鲜，是构成鲁迅小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。尤其是堪称《呐喊》中最重要小说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实际上正是由这类话语构成的。因此，在以国民性批判等等来定位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之前，有必要稍稍停下脚步，深入到“声”的层面加以分析。

因此，本文尝试从“声”的视角重新考察《呐喊》诸篇。首先，本文将依据《破恶声论》考察鲁迅意义上的“声”，尤其是“心声”的结构。其次，分析《呐喊》中混乱之“声”，并阐明其结构。最后，则着眼于“声”的结构，重新解读《狂人日记》。分析《呐喊》这样的文本群，必须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。鲁迅在写作各篇小说时，并不一定已经有意将其汇集为一部小说集，因此，将《呐喊》作为一个总体来把握并发掘其结构，未必完全符合历史语境。此外，以《狂人日记》之后的小说来解释《狂人日记》的结构，也有稍有时代错置之虞。尽管如此，笔者以为如果不将这篇小說置于《破恶声论》与《呐喊》诸篇之间，其独特位置便无法得到揭示。本文将在注意上述问题的同时，并不以提出一种包罗全面的《呐喊》研究为目标，而是旨在为理解《呐喊》以及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角度。

一、如何辨别“声”

鲁迅最早系统论述“心声”是《破恶声论》（1908）中。据鲁迅所言，“心声”乃是从“离伪诈”之人的“心”中发出的声音。既有研究也主要循此定义展开解释。也就是说，在研究“心声”时，往往倾向于将重点置于“心”。然而，既然“心声”是一种“声”，那么听者便无法直接看透“心”，而必须通过“声”来辨别“心”。实际上，《破恶声论》并不是一篇讨论“心”的文章，而是从听者的立场出发，论述如何辨别某种特定之声。换言之，并不是将与心相连的声音称作“心声”，而是将具备某些特征的声音认识为与“心”相连之物，并将其命名为“心声”。所谓与“心”相连，看似是前提，实际上却并非前提，而是作者=听者基于某种“声”所作出的推论；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。

那么，“声”若要被认识为“心声”，应当具备怎样的特征呢？这主要可以归纳为

² 本论之引文皆在鲁迅全集，容易翻阅，此处略去引用。

两个特征，即不变性与诚实性。诚实性指的是不利己，这一点在既有研究中已有较多论述，故此处暂且省略，且来看不变性。《破恶声论》的开头如此展开：生物皆会因外在因素而变化，人类也会随着季节改变情感，然而——

情若迁于时矣，**顾时则有所违拒**，天时人事，胥无足易其心，诚于中而有言；**反其心者**，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。……盖惟声发自心，朕归于我，而人始自有己……人各有己，而群之大觉近矣。若其靡然合趣，万喙同鸣，鸣又不揆诸心，**仅从人而发若机括**；林籁也，鸟声也，恶浊扰攘，不若此也……

这里被推至前景的并不是“心”，而是面对外在因素变动时的某种不变性。“心”正是由这种不变性所定义的。同时，这种不变性并不是相对于自然界的不变，而主要是相对于“他人”的不变。那么，这种不变性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？换言之，在“声”之中，究竟什么必须保持不变呢？那便是内在于“声”中的知识。“心声”之中必须保持不变的，是已经得到切实理解的“知识”。而是否理解某种知识，其判断标准则在于此人所拥有的知识是否具有系统性：

若夫自谓其言之尤光大者，则有奉科学为圭臬之辈，稍耳物质之说，即曰：“磷，元素之一也；不为鬼火。”略翻生理之书，即曰：“人体，细胞所合成也；安有灵魂？”**知识未能周，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，解释万事**。不思事理神闕变化，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，依此攻彼，不亦慎乎。夫欲以科学为宗教者，欧西则固有人矣，……惟首唱之士，**其思虑学术志行，大都博大渊邃，勇猛坚贞，纵连时人不惧，才士也夫！**

这里反复出现的意思是，拥有“心声”之人，乃是拥有系统学问，并相信且主张这种学问之人。当然，“博大”的知识与“勇猛”的人格，乃是“心声”的两个方面，但仍需注意，在这段引文中被强调的是前者。因为并不是只要拥有主张某种观点的勇气，便必然拥有“心声”；（甚至可以说真正的“勇猛”应该要有知识的“深邃”作为基础。这一点，读《科学史教篇》便很容易看出来。而那些只是稍稍听闻一点物理学、生物学知识，便据此提出某种主张的人，恰恰正是鲁迅批判的对象。）缺乏统整的知识，往往容易成为“活身之术”，一旦时势变化，便会被全然抛弃，因此并不具备不变性。如此看来，究竟相信何种知识，可谓是《破恶声论》中最为重要的主题。

理解知识并形成独自的见解，是“心声”的必要条件。构成这种见解的，是命题与逻辑回路；而在《破恶声论》中，作为恶声而遭到反驳的，正是“汝国民也”与“汝世界人也”这两个命题及其论述。而且，相较于命题本身，逻辑回路更为重要。鲁迅针对这两个命题加以反驳时，如下写道：

寻其立意，虽都**无条贯主的**，……至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，则有科学，有适用之事，有进化，有文明，其言尚矣，若不可以易。**特于科学何物，适用何事，进化之状奈**

何，文明之誼何解，乃獨函胡而不与之明言，甚或操利矛以自陷。嗟夫，根本且動搖矣，其柯叶又何侷焉。豈誠其隨波弟靡，莫能自主，則姑從于唱喁以熒惑人；抑亦自知其小陋，時為飲啖計，不得不假此面具以釣名聲于天下耶。

这里受到批判的，并非命题本身，而是其逻辑回路。若要将科学知识认识为“心声”，便必须整理其逻辑回路；若要“相信”某一命题，也就必须整理出论述该命题的逻辑回路。这些命题之所以受到批判，原因并不在命题本身，而在于其逻辑回路不合条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逻辑回路能够贯通，它便也可能成为系统性的知识，也就没有反驳的必要。而只要拥有这种系统性知识，便可能成为“心声”的持有者。

总而言之，对鲁迅而言，使“心声”得以从杂多的“声”中被辨别出来的，乃是在这种“声”中发现不变性。这种不变性不在他处，正在于逻辑回路能够贯通。逻辑回路之所以能够成为“心声”的必要条件，大概正在于：若从同一前提出发，并依循同一逻辑回路进行思考，便总能抵达同一结论。所谓“同一结论”的不变性，支撑着不变的见解，并构成了足以抵抗外在因素的“心声”。

由此，“心声”便能够从“声”中辨别出来；然而，与“心声”相对的“非心声”，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。《破恶声论》是以当时的启蒙者为对象的文章，因此主要批判的是利己之“声”；但在非“心声”的世界中，存在的并不只是利己之声。

若其靡然合趣，万喙同鸣，鸣又不揆诸心，仅从人而发若机括；林籁也，鸟声也，恶浊扰攘，不若此也，此其增悲，盖视寂漠且愈甚矣。

……胡寂漠之云云也。若如是，则今之中国，其正一扰攘世哉！

在《破恶声论》中，“扰攘”看似与“寂漠”指向同一事态，但二者的使用方式并不相同。正是由于这种使用方式的差异，非“心声”的世界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：其一，是名为“寂漠”的无声世界；其二，则是名为“扰攘”的、充斥着利己之“声”与模仿之“声”的世界。所谓“扰攘”之“声”，如前所述，乃是启蒙知识人所发出的声音；然而，问题在于，居住于“寂漠”这一世界中的究竟是谁？并且，倘若“寂漠”的世界是无声的世界，那么居于其中的人又为何无法发出“声”呢？

无声世界的居民究竟是谁，虽无法断然确定，但将其理解为非知识人的被启蒙者，大概并无不可。通常所谓鲁迅的国民性批判，所指向的正是这些非知识人。然而，在《破恶声论》中，这些被启蒙者非但不是批判的对象，反而被置于利己的伪启蒙者的对极，成为受到赞美的存在。

宗教由来，本向上之民所自建，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，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。顾瞻百昌，审谛万物，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，此即诗歌也，即美妙也，今世冥通神闕之士之所归也，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；斥此谓之迷，则正信为物将奈何矣。

盖浇季士夫，精神窒塞，惟肤薄之功利是尚，躯壳虽存，灵觉且失。

伪启蒙者试图排除的“迷信”，恰恰是被启蒙者向上精神的表现。正因为较之并无向上之精神的伪启蒙者，“向上之民”反而更可取，所以鲁迅才得出“伪士当去，迷信可存”的结论。只是，拥有“迷信”的“向上之民”，虽比伪启蒙者更具价值，却似乎并不能发出“心声”。既然其精神是高尚的，为什么又无法发出与之相应的“声”呢？这恐怕是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发出“心声”的工具，也就是具有条理的逻辑回路。因为“心声”的本质，原本正在于具有条理的逻辑回路。“迷信”虽被把握为向上精神的表现，却最终只停留在“可存”的判断之上，其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。

如上所述，在《破恶声论》中，鲁迅为了批判伪启蒙者，主张在“声”之中存在一种具有条理性的“心声”，并且又以“心声”与“扰攘”之“声”为标准，对被启蒙者的精神作出了部分肯定。然而，一旦站到启蒙被启蒙者的立场上，鲁迅便不得不面对启蒙的困难，以及“无声”之所以形成的原因。或许也正因如此，鲁迅在《呐喊》中着力表现了构成“无声”之原因的“声”的结构。

二、《呐喊》中“声”的结构

所谓“无声”，并不是说完全不发出任何声音。它并不像“扰攘”之“声”那样模仿他人的观点，而是指无法说出任何具有条理的话语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“心声”与“扰攘”之“声”，乃是彼此不同的无条理之“声”。我们不妨再次来看“引言”中所引《风波》的那段文字：

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，也想想些方法，想些计画，但总是非常模糊，贯穿不得：「辫子呢辫子？丈八蛇矛。一代不如一代！皇帝坐龙庭。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。谁能抵挡他？书上一条一条写着。入娘的！……」

无论怎么看，这段话都显得不知所云。然而，与意识流不同，它并不是将意识原样描出，而是表现出一种即便想说出有条理的话也终究无法做到的状态。只有“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”这一句具有完整的意义。这一句显示出七斤仍然健康，并且保有日常生活中的常识。不过，除此之外，词与词、句与句之间并不具备完整的逻辑回路，这一点也显而易见。“声”在此已完全陷入混乱，只能是不合条理之物。不只是七斤，在《风波》中，几乎所有人都发出这样的无条理之“声”。而他们之间的交流，也正是由这样的“声”构成的。

这时他[赵七爷]已经绕出桌旁，接着说，「……你可知道，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，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，他一支丈八蛇矛，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谁能抵挡他」……村人们呆呆站着，心里计算，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，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。

赵七爷宣称张勋乃是张飞的后裔，并且张勋正是使用张飞的蛇矛行事。它虽然具有逻辑形式，却全然不通。对此，村人们经过思考〔计算〕之后，竟然接受了这一说法。这里正是借“计算”一词，反过来表现其不能思考的状态。

不止思考的逻辑回路是不合条理的，逻辑的前提本身也是混乱的。所谓混乱，并不仅仅是说前提有误，更是因为前提总在不断变化。试看七斤嫂的话：

「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。六斤生下来的时候，不是六斤五两么？你家的秤**又是私秤，加重秤，十八两秤**；用了准十六，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。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，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，**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……**」

贯穿全篇的九斤老太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”的命题，其作为证据的重量这一前提，也始终处在变化之中。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前提之上的论证，自然无法令人信服。所谓逻辑回路与前提皆无条理的世界，也就是与“心声”相对立的“无声”世界。不只是《风波》，《呐喊》中所呈现的中国地方社会，除《社戏》之外，大体皆处于这样的世界之中。缺乏逻辑回路、前提又始终变化的“声”的结构，正构成了《呐喊》的主要部分。面对这样的世界，固然必须避免以“扰攘”之“声”加以判断，但若要以具有条理性的“声”进行分析，同样极为困难。《阿Q正传》的著名开头是这样的：

我要给阿Q做正传，已经不止一两年了。但一面要做，一面又往回想，这足见我不是一个「立言」的人，**因为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，于是人以文传，文以人传——究竟谁靠谁传，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，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，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。**

在《阿Q正传》第一章中，叙述者始终在推测阿Q的相关信息，其过程几乎如同侦探小说。然而，所有推理最终都归于失败。叙述者拥有正确的逻辑回路（考证的方法），但通向结论的出发点——也就是前提——却始终难以找到。阿Q是一个连姓名用字都无法确定、全然无法推理的人物。这种无法推理性，在开头已经有所暗示。“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”这一命题，其前提本身便是不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人若要成为不朽，便必须经由不朽之笔而被传写；然而，这支笔若要成为不朽，又必须首先以被其传写之人为不朽。然而……。结果，“究竟谁靠谁传，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”，无论如何推理，都无法抵达前提。因此，“传”也就成了一种无根据的行为。若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仍要为阿Q作传，那么其原因也只能归于思想中的“鬼”了。

不仅阿Q的信息无法推理，阿Q自身的“声”，其前提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。例如，阿Q以未庄为判断标准讥笑城里，又以城里为标准俯视未庄。这里前提发生变化的情形，与前文所说“笔”与“人”的关系是同构的。

居住于“无声”世界中的人，即便试图发出某种“声”，最终也仍然发不出来。《风波》中的村人试图进行某种议论，却终究未能成功，正是如此；《明天》中的单四嫂子亦然。单四嫂子始终在“计算”，却并不能发出像样的“声”。

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，指甲足有四寸多长，单四嫂子暗地纳罕，心里计算：宝儿该有活命了。

单四嫂子之所以推论儿子“该有活命”，理由不在他处，正在于何小仙指甲之长。鲁迅在此特意使用“思考”[计算]一词，反而揭示出单四嫂子身上的不条理性。不仅其逻辑回路是不合条理的，她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信息，也几乎全都无法成为推理的前提。

「先生，——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？」/「他中焦塞着。」/「不妨事么？他……」/「先去吃两帖。」/「他喘不过气来，鼻翅子都扇着呢。」/「这是火克金……」/何小仙说了半句话，便闭上眼睛……

从鲁迅批判中医的立场来看，这里大概也是有意让何小仙说出一番不知所云的话。这样的言语，终究无法通过推论加以补救。单四嫂子所居住的世界，是由支离破碎、彼此断裂的“声”构成的，是一切“计算”皆无法生效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单四嫂子唯一能够“计算”的，只有回家路上的先后顺序。此外，当阿Q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审判时，他唯一能够思考的，也不过是签名时能否把圆圈画圆而已。正如《阿Q正传》的开头所显示的那样，在词与词之间，前提与推论的差异无法得到确定。这并不是构成“心声”的、具有条理的言语，而只是不断并列、彼此之间并无逻辑关联的言语。面对这样的言语，逻辑从一开始便是无效的。在“无声”的世界中，知识也采取无条理的形态，或者采取某处传言的形态。正因如此，本应无甚重要性的头发才会被视为重要之物（《头发的故事》），而一切命题也都成为“差不多”之物（《端午节》）。最为直接地表现出这种知识形态的，仍然是《风波》：

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，每日一回，早晨从鲁镇进城，傍晚又回到鲁镇，因此很知道些时事：例如什么地方，雷公劈死了蜈蚣精；什么地方，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。他在村人里面，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。

七斤所谓“很知道”的东西，也就是他的“知识”，乃是一连串彼此没有关联、也没有根据的传闻。支撑这种“知识”的根据并不在其自身之中，而在于他人的权威。

「你怎么知道呢？」七斤嫂有些着急，赶忙的问。/「咸亨酒店里的人，都说要的。」

即便不知道他们为何这样说，仅仅因为那些人身处咸亨酒店之中，便足以为这一命题提供根据。此外，未经论证、突然降临于脑中的“声”，也可以成为知识。在《白光》中，陈士成的脑中便屡次有“声”降临。

但这寂静忽又无端的纷扰起来，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：/“左弯右弯……”/他耸然了，倾耳听时，那声音却又提高的复述道：/“右弯！”

这个声音同样是没有条理性的“谜语”。降临于陈士成脑中的“谜语”，是“左弯右弯，前走后走，量金量银不论斗”这一句。它既没有指定出发点，也没有指定距离，而且如果依照句中所示的方向行走，最终又会回到原处，因此确实可以说是“谜”。所以陈士成一直在推测这句话，却总是“以为解着了，然而立即又知道不对”。这是因为逻辑回路与前提皆已缺失，从一开始便不存在“解开”的可能。因此，仅凭这句话本身，并不足以使陈士成进一步行动。于是，所谓“白光”（月光）忽然出现，“不在这里……到山里去”这样的话语也突然降临，陈士成这才终于开始行动。当然，“白光”与“到山里去”这一指示并无任何根据，因此，其行动也成为一种毫无根据的胡乱行动。最终，陈士成精神失常，溺水而死。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并不少，但前述这种无条理性的“声”对他的拘囚，恐怕也是原因之一。

如果居住在这种无条理性之“声”的世界之中，那么即便试图从“心”中表达些什么，最终也无法说出像样的话，更无法成为拥有“心声”之人。丧子的单四嫂子无疑有着真实的感情，却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：

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。——我早经说过：他是粗笨女人。他能想出什么呢？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，太大，太空罢了。

阿Q在面对死亡之时，也同样感到了恐惧，但最终仍是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：

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，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。/“救命，……”/然而阿Q没有说。他早就两眼发黑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。

阿Q连“救命”也没有说出口。然而，即便他说出了这句话，它恐怕也不能成为“心声”。因为说到底，阿Q那“仿佛旋风似的”“思想”（“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”），并不会抵达任何地方，而是很快便消散无踪。

如上所述，在《呐喊》中，无条理性的“声”的结构遍在各地。这正是位于“心声”与“扰攘”之“声”这一二元对立背后的民众之“无声”的结构。村人们全都居住在由这种“无声”结构构成的世界之中；由于并不具备逻辑回路，无论如何“计算”，也终究被置于无法发出自身之“声”的命运之中。

三、狂人的言语

《狂人日记》中最受关注的，大概是中国历史乃是“食人”历史这一命题。百年来研究者围绕这一点作出了各种解释与评价。然而，迄今为止的研究，几乎都是将“食人”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展开的。即便是研究文本形式者，也未曾对“食人”这一命题本身投以怀疑的目光。但是，狂人关于“食人”的发现固然具有强烈冲击力，却并非如此自明。试来看这一发现的场面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狂人试图对“食人”加以“研究”，并将其弄清。“研究”主要是指运用科学方法分析事物；然而，试看引文，其中甚至并不存在多少近似于分析的过程。存在于其中的，只是“看出”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过程。不言而喻，正因为这一过程难以理解，读者才会自行加以论述，并补足其逻辑回路；但文本内部缺乏逻辑这一点，却无法否认。受降临于脑中的话语所引导，狂人发现“食人”命题的过程，正与《白光》中陈士成在月光之中发现埋银之处的过程相同。《狂人日记》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隐喻，鲁迅确实是在描写“狂人”的日记。因为《狂人日记》全篇正是由不合条理的话语构成的。试来看日记的开头。

……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/我怕得有理。

引文之中，至少在形式上具备了推论的形态。首先提出应当警戒（赵家）这一命题，随后说明其原因：因为赵家的狗向“我”看了两眼。由于这样的原因，狂人便确认了自己的命题。然而，这终究仍是无法理解的推论。狗的目光为何能够同警戒联系起来呢？想来，只有在赵家的狗=赵家的人、“看我两眼”=“盯上了我”这一前提成立时，这一推论才可能成立；但这显然是一种滑坡。因此，狂人的推论从前提到论证，都不得不说是合条理的。

此后，狂人以这个已经确认的命题为前提，进一步解释周围的世界，最终抵达中国历史乃是“食人”历史这一结论。当然，在抵达“食人”命题之前，他经历了种种不合条理的推论与跳跃。而在“食人”之后，他又通过不断叠加不合条理的推论，抵达了其他具有冲击力的结论——例如“救救孩子”。《狂人日记》中，正遍布着本文第二章所提出的“无声”结构；狂人并不是“心声”的持有者，而恰恰是在发出混乱的“声”。

不言而喻，《狂人日记》是一篇小说，因此并不需要像论文一样依据逻辑展开，而应当以艺术手法表达作者的观点。然而，此处存在着两重矛盾。第一重矛盾在于，向来被视为从《新青年》同人立场出发批判封建思想的《狂人日记》正文，实际上却违背了《新青年》同人的立场；第二重矛盾则在于，一向被视为《新青年》对立面的《狂人日记》序文，其实反而更接近《新青年》的立场。具体而言如下——

概而言之，《新青年》同人的立场，是高举科学与民主。所谓科学，并不仅仅是具体知识，也包括支撑这些知识的逻辑方法。只要稍读《新青年》杂志便可知道，为了批判封建思想，同人们总是指出这些思想中的矛盾；换言之，这是一种揭发其不条理性的行为。鲁迅、周作人等《新青年》同人，在《新青年》解散之后，也仍然以这一方法同旧思想作战。然而，正如竹内好早已注意到的那样，狂人的言语不同于所谓“作为清末启

蒙手段”的“胡适的口语³”。《狂人日记》中不断出现违背科学的论证。即便是“食人”这一在革新方面引起强烈反响的命题，实际上也是通过违背科学的论证而获得的，因此也可以说是反科学的。

与此相对，由于《狂人日记》的序文是以文言写成的，因此向来被视为反对白话革新的人的发言。也就是说，文言=保守方面，白话=革新方面，这一二项对立在此先行存在。正因如此，狂人在故事结尾“全愈”一事，往往被视为启蒙的失败，并长期困扰着研究者。也有研究将之解读为，日记已经被序文的执笔者篡改⁴。然而，在鲁迅写作之时，文言并不必然意味着保守。毋宁说，主张科学的文章皆以文言写成。举例而言，刊载《狂人日记》的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中，有陈独秀《有鬼论质疑》、陈大齐《辟灵学》等批判非科学思想的文章，而这些文章皆以文言写成；在当时，与其说白话，不如说文言才是科学的语言。因此，仅仅因为《狂人日记》的序文以文言写成，便断定其属于保守方面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实际上，序文明显比正文更为“科学”。《狂人日记》设定为由序文的书写者摘录并投稿给《新青年》的文本，也就是一种读者投稿。按照这一设定，（被表现出的）序文的书写者乃是比《新青年》的读者早一步读到日记的人⁵，而序文的一半，也可以说正是在解读日记。试来看这种解读。

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

序文的书写者读过日记之后，便断定狂人大概患有“被害妄想狂”。其理由在于，“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”。此外，他试图根据墨色判断写作时间，又试图根据内容寻找文章之间的关联，却并未作出勉强的判定。其次，所谓“日记中所见语误，一字不易”，也可以看出他与任意从文字之中看出其他文字的狂人不同，乃是重视材料真实性的人。这确实是一种前提与逻辑回路皆相当整饬的审慎逻辑，与狂人不合条理的论证形成了对照。这里还应注意“迫害狂”这一词语。它并不是鲁迅一贯批判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用语，而是他在日本所学的西洋医学术语。因此，“以供医家研究”这一说

³ 竹内好《「狂人日記」について》（《竹内好全集》第一卷、筑摩書房、一九八〇年、二二五頁）

⁴ 王欽、《啓蒙の声を「翻訳」する—『狂人日記』を読む》（《魯迅を読もう：〈他者〉を求めて》、春秋社、二〇二二年）

⁵ 我这里并不主张序言之“作者”是实际存在的人物（因为此前对这里的论述有如此误解）。只是说，从这篇文章的设定来说，这个序言是在评论此后的日记正文。两者仍是文本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事实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

法，也是面向代表科学的西洋医学而发出的言辞。此外，还应注意，序文的书写者、狂人以及狂人的兄长，都是“中学时代”的良友。从设定上说，他们是接受过近代知识训练的人，可以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晓科学。因此，（设定上）序文的书写者将日记投稿给《新青年》这一主张革新的杂志，并且面向代表科学的西洋医学专家撰写序文，正表明他与《新青年》同人一样，也是支持科学的一人。要之，无论从逻辑形式来看，还是从书写者的姿态来看，序文明显都立足于《新青年》所谓“科学”的立场。

如果说《狂人日记》的正文由不合条理的“声”构成，而序文则由近似于“心声”的整饬论证构成，那么，相较于序文接近《新青年》的立场，正文反而是远离《新青年》立场的。然而，对鲁迅而言，狂人其实既不能说是批判的对象，也不能说全然不是。因为白话与文言在这里未必构成对立，鲁迅也未必必须赞成或批判其中一方。毋宁说，可以认为鲁迅在写作序文与日记时都并未将其视为完全的正面形象。

从本文第一章所论《破恶声论》的视角来看，发出不合条理之“声”的狂人，终究不能说是理想的“心声”持有者。然而，这是因为鲁迅写作《破恶声论》之时，主要仍处在文言的世界之中，甚至未曾设想以白话来表现“心声”。因此，为了在多样的“声”中发现“心”，他举出了不变性=逻辑的条理性这一标准。然而到了《新青年》的时代，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在《新青年》第二、三、四卷中胡适与钱玄同的讨论里，白话开始被视为比文言更接近“心”的语言。钱玄同是鲁迅的好友，鲁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讨论。因此，在逻辑这一层面之外，白话也成为判断“心”的一种标准；并且可以认为，鲁迅有可能正是使用了胡适、钱玄同讨论中所共有的白话，来表现狂人的“心”。狂人的言语并不属于“心声”，却完全可能是来自“心”的“声”。

不过，使用白话并不必然意味着无条件赞同白话。与“心”密切相连的“声”，也并不必然就是最有价值的“声”。《破恶声论》中有如下表述。

若其本无有物，徒附丽是宗，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，则吾愿先闻其白心。使其羞白心于人前，则不若伏藏其论议，荡涤秽恶，俾众清明，容性解之竺生，以起人之内曜。

不妨将“扰攘”之声的持有者转变为“心声”持有者的过程理解为：自白其“心”正是其中一环。若要发出“心声”，仅仅具备“心”仍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整理（“荡涤”）其“心”。即便狂人的日记以白话写成，意味着它表现了狂人的“心”，也并不等于理想的“心声”已经存在于其中。若要发出“心声”，终究仍须具备具有条理性的逻辑回路。因为若非如此，“心”便不具有不变性。实际上，在《狂人日记》中，狂人的思想始终处于变化之中，最后其病更是“全愈”了。“全愈”仍然意味着他回到了普通人的世界，也就是其兄以及序文书写者的世界。其原因虽未在小说中明示，但至少应当认为，他原先的观点已被放弃。狂人终究发生了变化。已经变化了的狂人，并不是以不变性为本质的“心声”的持有者。若问狂人为何不断辗转变化，恐怕正是因为他虽然拥有“心”，却并不具备整饬的“声”。或许也可以说，“心声”的持有者已“无法以积

极的形式被形象化”⁶了；但笔者认为，鲁迅在此也对钱玄同等人仅仅重视白话的白话文运动提出了异议。

另一方面，鲁迅也未将序文定位为理想的“心声”。因为序文固然拥有具有条理性的论证，但其中的人物——序文的书写者、狂人、狂人的兄长——都在轻率地判断他者。不妨回想《破恶声论》中受到批判的伪启蒙者：他们高唱科学、试图破除迷信，却只是以科学的语言轻率地断定被启蒙者，并无视其“心”。鲁迅认为，这乃是凭一己之见裁断他者，并将他者作为自身私利工具的行为。序文中的人物，也都凭借自己的判断将狂人视为“病人”，任意裁断其“心”。这样的声音，不能称为“心声”。鲁迅对这类人，大概也并未完全赞同。如此看来，笔者认为，鲁迅也借由序文，向那些标举科学的人暗示了自己的异议。

总而言之，在《狂人日记》中，正文虽可见“心”，却缺乏逻辑性；另一方面，序文虽具备逻辑性，却并不成为“心声”。序文与日记并非对立关系，鲁迅乃是借《狂人日记》，对《新青年》的科学立场以及钱玄同等人所标举的白话提出异议。

结语

鲁迅直至晚年仍然重视“心声”。然而，由于他人的“心”无法被直接看见，“心声”终究只能是具备某些特征的“声”。因此，尽管鲁迅重视“心”，他却始终将重点置于“声”的辨别与描写之上。其辨别标准，在于“声”中是否具备命题与逻辑回路。在1908年的《破恶声论》中，鲁迅将启蒙者的“声”区分为“心声”与“扰攘”之“声”。与此相对，加入作为启蒙者一方的《新青年》之后，鲁迅开始描写一般人的“声”。在《呐喊》中，那些不具备正常逻辑回路的人们，正处于一种即便试图表达自己的“心”，也无法将其表达出来的困境之中。

从这一视角来看，《狂人日记》可以说是《呐喊》中颇为异色的一篇。正如本文第三章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，《狂人日记》看似从启蒙者的立场批判传统，实际上却具有并不赞成文言序文、也不赞成白话正文的一面；换言之，它也具有不赞成启蒙者的一面。这与鲁迅写作《狂人日记》时的位置感有关。《呐喊》是鲁迅从《新青年》同人这一启蒙者团体的立场出发描写国民性的作品集；但在写作《狂人日记》之时，鲁迅尚未成为《新青年》同人。正如读者来信这一形式所显示的那样，这篇小说乃是从《新青年》之外而来的。在《呐喊·自序》中，鲁迅叙述了自己加入《新青年》同人的过程。远离外部世界、闭居于S会馆中抄写古碑的鲁迅那里，金心异（钱玄同）来了。钱玄同请求鲁迅加入《新青年》同人，但鲁迅对启蒙的效果提出疑问。对此，钱玄同诉诸“希望”。鲁迅

⁶ 北岡正子《魯迅 救亡の夢のゆくえ》（関西大学出版部、二〇〇六年、一一九頁）

接着如下陈述自己的想法。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。

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。其一，鲁迅写小说的理由，或者说加入《新青年》同人的理由，并不是赞同钱玄同的主张，而是无法驳倒这一主张。其二，鲁迅虽无法驳倒钱玄同的主张，但鲁迅自己的主张也并未被钱玄同驳倒。因为“希望是在于将来”，在当下此刻并无法判定。因此，鲁迅仍然继续“确信”自己的意见。也就是说，在写作《狂人日记》之时，鲁迅乃是尚未被钱玄同的主张说服的鲁迅。

因此，笔者主张，正因为这是一篇投稿给《新青年》的文章，鲁迅必须将启蒙者立场上批判传统的姿态置于前景；但另一方面，由于他并不完全赞同《新青年》同人的主张，便在形式层面暗中提出了异议。

然而，既然《狂人日记》刊载于《新青年》，它自然也就被视为《新青年》的一部分。而既然它是《新青年》的一部分，鲁迅当然也就被视为赞同《新青年》主张的一人。此后，鲁迅接连写作国民性批判的小说与杂文，进一步固定了其国民性批判作家的形象。《狂人日记》也被收入《呐喊》，并作为具有启蒙立场的《呐喊》的一部分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如此一来，鲁迅在写作《狂人日记》之时的位置便被遗忘，《狂人日记》形式的由来也随之变得难以理解了。

黄嘉庆 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

landowskasugoi@yahoo.co.jp